

## 論朱子之文學觀於錢穆所見

著者	程 遠
journal or publication title	東北大學中國語學文學論集
volume	18
page range	123-148
year	2013-12-30
URL	<a href="http://hdl.handle.net/10097/57421">http://hdl.handle.net/10097/57421</a>

## 論朱子之文學觀於錢穆之所見

程 遠

錢穆(1895—1990),字賓四,江蘇無錫人,中國近現代之著名學者。曾歷任燕京大學、北京大學、清華大學、四川大學、齊魯大學、西南連合大學教授。於1949年赴香港,獨立創辦新亞書院(即今日香港中文大學之一部)。1966年,應蔣中正之邀移居臺灣,任臺灣大學歷史系教授。1990年8月,逝世於臺北。錢穆著作極多,後大體全收入《錢賓四先生全集<sup>1</sup>》之中<sup>2</sup>。

錢穆乃是近現代中國最偉大的國學大師之一。其學問宗旨,不在創新,而在於探求中國文化之傳統精神。故而錢穆弟子余英時認為,錢穆學術之精要,在於“一生為故國招魂<sup>3</sup>”,並認為這是錢穆“最終極而且也是最後的關懷<sup>4</sup>”。錢穆追求“通學”,著作超過一千萬字,內容遍及經史子集四部。然而今日之學者,大部份只注目於錢穆之史學,而忽視了錢穆的文學觀。

錢穆有關文學思想或文學史之著作,主要有二。一為《中國文學論叢》<sup>5</sup>、一為《理學六家詩鈔》。前者乃是“有關中國文學之講演稿及少許筆記<sup>6</sup>”,而後者則是理學家<sup>7</sup>的詩選集。以筆者管見,現今有關錢穆文學觀之先行研究,並不多見。<sup>8</sup>並且,大都採用《中國文學論叢》

<sup>1</sup> 《錢賓四先生全集》,1998年由聯經出版公司出版。

<sup>2</sup> 根據《錢穆先生學術年譜》整理。韓復智《錢穆先生學術年譜》(臺北)國立編譯館2005年

<sup>3</sup> 此句乃是余英時為錢穆所作挽聯中的一句。挽聯全文如下:“一生為故國招魂,當時搗麝成塵,未學齋中香不散。萬里曾家山入夢,此日騎鯨渡海,素書樓外月初寒。”余英時《錢穆與中國文化》頁19上海遠東出版社1994年版。

<sup>4</sup> 余英時《錢穆與中國文化》頁20上海遠東出版社1994年版。

<sup>5</sup> 亦有以《中國文學講演集》為研究材料之學者。然而,《中國文學講演集》只是《中國文學論叢》之刪減本,並不錄入《錢賓四先生全集》。

<sup>6</sup> 《錢賓四先生全集》第45冊《中國文學論叢》《再序》頁7。

<sup>7</sup> 邵康節、朱晦庵、陳白沙、王陽明、高景逸、陸桴亭之六人。根據《錢賓四先生全集》第46冊《理學六家詩鈔》頁3之序文。

<sup>8</sup> 先行研究大多為大陸學者之論文。茲列如下:

嚴金東《隨俗與雅化——錢穆的一種比較文學觀》《中國比較文學》2004年第1期。此文乃是闡

作為研究之素材，而無視了《朱子新學案》等書之中有關文學之部份。錢穆乃是極尊朱子之學者，如果無視此立場，則不能完全看出錢穆文學觀的立場與思想淵源。至今所見先行研究中，並無涉此。有鑒於此，本論專注於錢穆所如何闡述之朱子文學觀，並解釋朱子與錢穆使用同一評判標準，卻於評價韓愈上產生分歧的問題。

另，本論所用有關錢穆之資料底本，為聯經公司出版發行之《錢賓四先生全集》。

## 第一章 錢穆眼中之朱子文學觀

朱子乃一理學家，其立於理學立場以觀文學，有“文道合一”之論。此“文道合一”觀，尤為錢穆所重。《朱子新學案》乃是錢穆晚年集大成之著，其於《朱子新學案》中，特立《朱子之文學》一章，將《語類》與《文集》中有關文學之部份逐條抽出，加以剖析注解。故而，如何評價把握朱子之文學觀，亦是錢穆文學觀之一重心。此一點，以管窺之，為前人所不論。苟若非探究錢穆於朱子之所見，則其文學觀欠缺思想之源頭，而不能明所以。《朱子之文學》一章，長而難讀，於朱子文學觀之特點，分類亦不甚明晰。故而在此特將其重新整理，分門別類，以明錢穆眼中之朱子文學觀。

---

述錢穆所論東西方文學之不同。

芮宏明《這是我講文學史的最大觀點——試述錢穆關於魏晉文學觀念自覺的闡釋》《江西社會科學》2004年第6期。此文乃是講述錢穆所論魏晉文學之“自覺”概念。

許結《錢穆文學批評觀述略》《江南大學學報》2005年第4期。此是講述錢穆有關詩經之評論。

宋薇 馬力《從文以載道到藝術就是人生——錢穆美學思想基本問題論析》《河北大學學報》2005年第6期

宋薇《錢穆道論及其美學闡釋》《河北大學學報》2005年第6期

以上二文，是從美學角度，探討錢穆之藝術論。

侯敏《錢穆文化詩學探論》《甘肅社會科學》2006年第1期。此文是探討錢穆所見之人生與詩的關係。

項念東《從秋興情結看中國文學的自省精神——讀錢穆晚學盲言割記之一》《遼東學院學報》2008年第10卷第2期。此文乃是論錢穆所謂中國文學的“自省精神”。

李詠吟《在詩史互證中顯現文明的美麗——陳寅恪與錢穆詩學解釋的自由意向》《東疆學刊》2008年第25卷第3期。此文是比較陳寅恪、錢穆對東西方文學所見之不同。

吳衍發《錢穆文學藝術美學思想論析》《十堰職業技術學院學報》2009年第8期。此文是論述錢穆有關音樂藝術之見解。

至於日本諸論文，所見僅兩篇，均為有關錢穆歷史學觀之研究：

內田健太《錢穆「記公安三袁論學」について》《岐阜聖徳学園大学紀要》教育学部編 2009年

福田真吾《近代中国における「楊朱」観——張爾田と錢穆の場合》《白山中国学》2011年第1期

朱子為理學之集大成者，其“文道合一”之觀點，亦是理學家文學觀之一高峰。為清晰脈絡計，特將朱子“文道合一”之觀點簡論於此。

朱子之前，理學家在處理文道之關係上，著力提高道之重要性。然而不論如何闡述二者之關係，究竟是將文與道視為二物。<sup>9</sup>直至朱子，提出“文道合一”之論，則徹底將文之概念併入道之概念。此處特為明晰計，故於朱子語後附入現代白話翻譯。

才卿問：“韓文《李漢序》頭一句<sup>10</sup>甚好。”曰：“公道好，某看來有病”。陳曰：“‘文者，貫道之器。’且如《六經》是文，其中所說皆是這道理，如何有病？”曰：“不然。這文皆是從道中流出，豈有文反能貫道之理？文是文，道是道，文只如喫飯時下飯耳。若以文貫道，卻是把本為末，以末為本，可乎？……”<sup>11</sup>（陳文蔚（字才卿）問：“韓愈文集李漢所做序的第一句，說得很好。”朱子回答說：“你說好，我覺得有錯誤。”陳文蔚問：“‘文，是貫道的器物。’好比六經就是文，其中所說的都是這個道理，如何能有錯誤？”朱子說：“不是這樣的。這文都是從道裏面流出來的，哪兒有文反而貫穿道的道理。文就是文，道就是道，文只能是用來吃飯的時候下飯。如果用文來貫道，卻

<sup>9</sup> 如周濂溪之“文以載道”之論：文所以載道也。輪轅飾而人弗庸，徒飾也；況虛車乎！文辭，藝也；道德，實也。篤其實，而藝者書之，美則愛，愛則傳焉。賢者得以學而至之，是為教。故曰：“言之無文，行之不遠。”……不知務道德而第以文辭為能者，藝焉而已。噫！弊也久矣！（文是用來裝載道的，裝飾了輪子和車轅，人卻不用，那就只是裝飾而已；更何況空空的車呢。文辭，是藝術；道德，是內容。加厚其內容，而用藝術來書寫，文辭美麗了人就會喜愛，人喜愛了就能傳播。聰明人學了文而達到道，這就是教化。所以說：“言辭沒有文采，就不能傳播得遠。”……不知道致力於道德而只是以文辭為能的，不過是藝罷了。唉，這個弊病已經有好久了。）（《通書·文辭第二十八》，《周敦頤集》頁35-36 中華書局2009年版）

濂溪強調，文章之用，在於“載道”。綺麗之文字詞句，雖有助於文章之遠流久傳，然寫文章之基本，仍在於“篤其實”，即“道”之篤實充盈。濂溪之態度，乃是重道而不廢文也。又如程伊川之“作文害道”：問：“作文害道否？”曰：“害也。凡為文，不專意則不工，若專意則志局於此，又安能與天地同其大也？《書》曰‘玩物喪志’，為文亦玩物也。……”（有人問：“寫文章有害於道麼？”先生說“有害的。但凡做文章不專注就做不漂亮，如果專注了就會被局限於此，又怎麼能達到和天地同大的境界呢？《尚書》說‘玩物喪志’，作文也是玩物。……”）（《河南程氏遺書》卷第十八，《二程集》頁239 中華書局2004年版）。伊川以為，若要文章精巧美觀，則必須專心用功於文字。但若一意專心追求文章之精美，則志向便被局限於此，不得領會“與天地同其大”之大道境界。故而文乃是一玩物，專心於玩物，則求道修身之志向便會喪失。伊川將文與道完全對立，完全否定文之價值，乃是一種極端之文學觀。

<sup>10</sup> 即是下文陳才卿所引“文者，貫道之器”一句。

<sup>11</sup> 《朱子語類》卷一百三十九，《朱子全書》第18冊頁4298 上海古籍出版社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。中有“這文皆是後道中流出”句。蓋不通。故此處依據中華書局本《朱子語類》（《朱子語類》八 頁3305，中華書局1986年3月版）改為“這文皆是從道中流出”。

是把根本當做了末梢。以末梢當做根本，可以麼？……”）

朱子以為，從邏輯上言，文無法貫道。因文乃是“從道中流出”之物，只是道之表現。從本源上說起，文與道本就是同一之物。若以文貫道，則是“把本為末，以末為本”的本末倒置之舉了。故而古文家所言“文以貫道”之說是不可的。

道者文之根本，文者道之枝葉。惟其根本乎道，所以發之於文，皆道也。三代聖賢文章皆從此心寫出，文便是道。今東坡之言曰：“吾所謂文，必與道俱。”則是文自文而道自道，待作文時，旋去討個道來入放裏面，此是它大病處。……不是先理會得道理了，方作文，所以大本都差。……如東坡之說則是二本，非一本矣。<sup>12</sup>（道是文的根本，文是道的枝葉。只因為以道為根本，所以從文中所發出的，都是道。夏商周三代聖賢文章都是從這心裏寫出來的，文就是道。現在蘇東坡說“我所說的文，一定和道在一起。”那麼文自是文而道自是道，等到寫文章的時候，旋即去討要一個道來放進文裏面，這就是蘇東坡大錯的地方。……不是先懂得道理了，才開始寫文章，所以蘇東坡大的根本都錯了。……如蘇東坡說的，文和道就是兩個根本，而不是一個根本了。）

以朱子之見，道與文，乃是“根本”與“枝葉”之關係。將道“發之於文”，則文也是道。故而文道本是一體，並不可兩分。如蘇東坡文“與道俱”之論，乃是作文之時“討個道來入放裏面”，是從“大本”上就錯誤了的。王運熙在《中國文學批評史》中，針對朱子之“文道合一”，做了簡單而精當的概括：

朱熹在這裏所反復強調的是：文、道必須合一，有道就有文，文便是道。<sup>13</sup>

那麼，錢穆又如何評價朱子之文道觀？此處，將《朱子新學案》與《朱子學提綱》中有關朱子文學之部分，重新分類，以彰錢穆之見解。

一、錢穆以為，朱子一生之中，極喜愛、重視文學，自始至終，孜孜以求。

錢穆先證明，朱子在二十歲前少年之時，喜讀文學，尤以曾南豐、韓退之為最。關於朱

<sup>12</sup> 《朱子語類》卷一百三十九，《朱子全書》第18冊頁4314上海古籍出版社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。

<sup>13</sup> 王運熙《中國文學批評史》頁114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。

子愛讀南豐、退之文，錢穆引用如下例證：

《文集》卷八十三《跋曾南豐帖》謂：熹未冠而讀南豐先生之文，愛其詞嚴而理正，居常誦習。以為人之為言，必當如此，乃為非苟作者。（我未滿二十歲的時候就開始讀曾鞏先生的文章，愛他文章的詞句嚴謹、道理正確，日常時時誦讀學習。我私以為人發言語，必應當如此，不單單只是寫文章的人應該這樣。）

又卷八十四有一《跋》，謂：余年二十許時，便喜讀南豐先生之文而竊慕效之。竟以才力淺短，不能遂其所願。<sup>14</sup>（我二十多歲的時候，便喜歡讀曾鞏先生的文章，並且私底下偷偷想著去模仿。最後因為才力不足，不能遂我所願。）

《文集》卷八十三《跋方季申所校韓文》云：余自少喜讀韓文。<sup>15</sup>（我從小就喜歡讀韓愈的文章。）

錢穆又如下，證朱子最少於四十歲前用力於文。

又《語類》有云：先生喜韓文《宴喜亭記》及《韓宏碑》。（一三九）<sup>16</sup>（朱先生喜愛韓愈的《宴喜亭記》和《韓宏碑》。）

此條楊方記，在乾道庚寅，朱子年四十一。此見朱子夙好文章，年過四十，其弟子來學者，猶稱道及此。

又《文別集》卷三《與程允夫》一帖謂：往年誤欲作文，近年頗覺非力所及，遂已罷去，不復留情其間。（往年錯誤地想去學寫文章，近些年才覺得這不是我力所能及的，於是便放棄了，不再在學文章裏留心了。）

此帖尚在早年，謂“近見延平李先生，始略窺門戶”云云，是朱子自見延平後，即刻意探討理學。然於詩文工夫實亦未盡放棄。

《語類》又云：某四十以前尚要學人做文章，後來亦不暇及此矣。（一三九）（我四十歲以前還想著要學習別人做文章，後來也沒有時間顧及了。）

<sup>14</sup> 《錢賓四先生全集》第15冊《朱子新學案（五）》頁168。

<sup>15</sup> 《錢賓四先生全集》第15冊《朱子新學案（五）》頁170。

<sup>16</sup> 此處數字，乃是錢穆所注《朱子語錄》之卷數。

可見朱子用心為文，至少當及其四十時。<sup>17</sup>

錢穆最後證，朱子於臨終前，亦不忘注力於文學。朱子去世前三日，修《楚辭集注》一段，此乃朱子之絕筆。錢穆以為此乃值得“大書特書，標而出之”之事，為“後人群認為理學家則必輕文學”之論翻案。

朱子於文學，生平有三大著作。一在中年，為《詩集傳》，已略述於經學篇。又二為《韓文考異》與《楚辭集注》，皆在晚年。《韓文考異》校勘精密，識解明通，不僅為校勘學開出無窮法門，而凡所斷制，實多有僅知從事校勘者所莫能窺其高深之所在。蓋自有《考異》，而《韓集》遂有定本可讀，後人亦卒莫能超其上。《楚辭集注》亦為治《楚辭》者一必讀書。此乃朱子晚年最後完成之一部著作。在其易簣前三日，改《大學·誠意》章，又修《楚辭》一段。其改《誠意》章，人人知之，而朱子一生最後絕筆，實為其修《楚辭》一段，此則後人少所述及，尤當大書特書，標而出之，以釋後人群認為理學家則必輕文學之積疑。<sup>18</sup>

錢穆以為，朱子少年即愛讀韓、曾之文，四十歲前未放棄“詩文功夫”，臨終亦不忘改《楚辭集注》，則可證由始及終，朱子未嘗輕視文學。並以此為理學家不盡輕文學之證據。

## 二、錢穆極度推崇朱子之“文道合一”

錢穆又以為，理學家於文學有所輕視，只有朱子文道並重，其文道合一之觀念，乃是極高明之文學觀，推崇備至。其論如下：

理學家於文學，似乎最所忽視。濂溪有“文以載道”之論，其意重道不重文。惟朱子文道並重，並能自為載道之文。<sup>19</sup>

既如此，錢穆又如何分析把握朱子“文道合一”之文學觀？推崇之理由又為何？此為極重要之問題，故而說明如下。

<sup>17</sup> 《錢賓四先生全集》第15冊《朱子新學案（五）》頁170-171。

<sup>18</sup> 《朱子學提綱》，《錢賓四先生全集》第11冊《朱子新學案（一）》頁236-237。

<sup>19</sup> 《朱子學提綱》，《錢賓四先生全集》第11冊《朱子新學案（一）》頁230。

其一、錢穆以為，朱子之“文道合一”乃是一重道之文學論。引《與汪尚書》與《答呂伯恭》二書信以為例證：

《文集》卷三十《與汪尚書》有曰：去春賜教，語及蘇學，以為世人讀之，止取文章之妙，初不於此求道，其失自可置之。夫學者之求道，固不於蘇氏之文矣。然既取其文，則文之所述，有邪有正，有是有非，是亦皆有道焉，固求道者之所不可不講也。若曰惟其文之取，而不復議其理之是非，則是道自道，文自文也。道外有物，固不足以為道。且文而無理，又安足以為文乎？即文以講道，則文與道兩得而一以貫之。否則亦將兩失之。……（去年春天蒙受教誨，您說到蘇東坡的學問，認為世人讀到蘇東坡的文章，只是認可文的妙處，本來就不在他的文章裏求道，那麼蘇東坡的錯失自然可以放到一邊。學者求道，本來就不是從蘇東坡的文章裏求。然而既然認可了他的文，那麼他文裏所說的，有邪有正，有是有非，這裏面都關乎道，本來就是求道的人不可以不講的。如果說只認可他的文，而不論文中道理的對錯，那麼就是道自是道，文自是文了。道的外面還有道，就不能夠成為道了。文中沒有道理，又怎麼能成為文呢？就著文講道，那麼文和道就能同時得到，一以貫之。否則，兩者都會被弄丟了。……）

《文集》卷三十三《答呂伯恭》有云：……夫文與道，果同耶異耶？若道外有物，則為文者可以肆意妄言而無害於道。惟夫道外無物，則言而一有不合於道者，即於道為有害。但其害有緩急深淺耳。屈宋唐景之文，熹舊亦嘗好之矣。既而思之，其言雖侈，然其實不過悲愁、放曠二端而已。日誦此言，與之俱化，豈不大為心害，於是屏絕不敢復觀。……（……文和道，到底是一樣還是不一樣呢？如果道的外面還有道，那麼做文章的人就可以肆意亂說卻對道無害了。只有道的外面沒有道，那麼言語只要一有不合道的地方，就會對道有害。只是這個害處有緩和急、深和淺的區別罷了。屈原、宋玉、唐勒、景差的文章，我曾經也喜歡過。轉而又想，他們的言辭雖然華麗，然而其內容不過就是悲愁、放曠兩個極端而已。每天誦讀這些言辭，跟隨它們一起改變，豈不是大大地於心有害么，於是我放棄了它們不敢再看了。……）

此皆純就文道合一之標準立論。謂文而違道害道，當加屏絕，誠屬正論。及晚年，為《楚辭集注》，《序》文中仍於屈宋之悲愁放曠致不滿。<sup>20</sup>

<sup>20</sup> 《錢賓四先生全集》第15冊《朱子新學案（五）》頁176-177。



朱子《與汪尚書》信中言，蘇軾之類“止取文章之妙”，而“不求於此道”之類，並不足取。需“即文以講道”，道與文才能“一以貫之”。《答呂伯恭》中言，文中若有“不合於道者”，則於道有害。錢穆以為，這才是“文道合一之標準”。如屈原宋玉之文，只是表現“悲愁、曠放”兩個極端的情感，故而“大為心害”。文必須與道一致一貫，文不能害道。

其二、錢穆以為，朱子“文道合一”論，重道亦重文。此為上一條之補充，意在強調朱子“文道合一”中，並未輕視文，而亦須注意用功。其論證如下：

朱子亦多就文論文語，所論率多著眼於文章之神理氣味。理學注重人格修養，一文之神理氣味，即是此文之文格表現，亦即是此文作者心智修養之表現。故曰：貫串百氏及經史，乃所以辯驗是非，明此義理。豈特欲使文詞不陋而已。義理既明，又能力行不倦，則其存諸中者必也光明四達，何施不可。發而為言，以宣其心志，當自發越不凡，可愛可傳。（貫穿百家之言和經史，乃是要以此辨明是非，知曉義理。這豈是只想要讓文詞不鄙陋而已呢？已經知曉了義理，又能夠力行不倦，那麼存儲在心中的東西必定能光明普照，做什麼不可以呢？把心中的東西抒發為言語，用來宣揚心志，那就應當自然地越來越不平凡，可以被喜愛、可以被傳揚。）

其論西漢有曰：董仲舒文字平正，只是困善，無精彩。匡衡、劉向諸人文字皆善弱，無氣焰。司馬遷文雄健，意思不帖帖，有戰國文氣象。賈生文字雄豪可喜，只是逞快，下字時有不穩處。（董仲舒文字端正平整，只是軟弱無力，沒有精彩的地方。匡衡、劉向等人文字都很軟弱，沒有氣勢。司馬遷文章雄健，文章內容也不平帖收斂，有戰國文章的氣象。賈誼文字雄豪為人喜愛，只是太放縱了，寫文章的時候有不穩當的地方。）

武帝以前文雄健，武帝以後便實；到杜欽、谷永，又太弱無歸宿了。（漢武帝以前的文章雄健，漢武帝以後的文章就實在；到了杜欽、谷永，他們的文章又太軟弱、失去旨歸了。）

朱子以理學大師，而於仲舒、匡、劉、杜、谷儒者之文皆致不滿。又論仲舒文尚在司馬相如、揚雄之上。此等處，皆見朱子論文學之獨具隻眼處。其論宋文則曰：

東坡文字明快，老蘇文雄渾，儘有好處。（蘇東坡文章明白流暢，蘇洵文章雄健渾厚，都有好處。）

從理學立場論，朱子極不喜蘇氏父子。就文論文，則加讚許。<sup>21</sup>

<sup>21</sup> 《朱子學提綱》，《錢賓四先生全集》第11冊《朱子新學案（一）》頁233-234。

錢穆用此段，證朱子“就文論文”，於文章本身下功夫，重文章之“神理氣味”。而文章之表現，又是作者“心智修養”之表現。朱子以理學家之身份，而能以作者之人格與心智品評文學，是獨具慧眼的。朱子雖不喜蘇氏父子，仍能品出蘇軾文之“明快”或蘇洵文之“雄渾”，可見還是重視文本身的。

其三、錢穆以為，“文道合一”乃一廣義之文學觀，乃理學者與文學者雙方共有之標的。其引用朱子之《讀唐志》，論證如下：

歐陽子知政事、禮樂之不可不出於一，而未知道德、文章之尤不可使出於二。有是實於中，則必有是文於外。蓋不必托於言語，著於簡冊，而後謂之文。《易》之卦畫，《詩》之詠歌，《書》之記言，《春秋》之述事，與夫《禮》之威儀，《樂》之節奏，皆已列為《六經》，而垂萬世。其文之盛，後世固莫能及。（歐陽修知道政治和禮樂不能不出於一個根本，卻不知道尤其不能讓道德和文章出於兩個根本。有什麼樣的內容在裏面，就必定有什麼樣的文在外面。不一定非要藉助言語，寫在竹簡書冊上，然後才能稱作文。《周易》的卦畫、《詩經》的歌詠，《尚書》的記言，《春秋》的敘事，《禮》經的威儀，《樂》經的節奏，都已經列為六經，傳之於萬世。這些文的昌盛，本來就不是後世所能達到的。）

此乃言廣義之文學，以經學、文學貫通合一言之，而理學精神亦自包孕在內。朱子論學重博通，重一貫，故能言及於此。<sup>22</sup>

錢穆以為，朱子將經學、文學、理學之精神融匯一爐、一以貫之，故而朱子所言之文學，所含豐富，是一種“廣義之文學”。此廣義之文學，方能盛而傳之後世；朱子之文學觀，亦是一種廣義之文學觀，應為所有學者之為學目標。其言如下：

輕薄藝文，實為宋代理學家通病。惟朱子無其失。其所懸文道合一之論，當可懸為理學、文學雙方所應共赴之標的。惜乎後世之講學論文者，精神氣魄，不足以副此，而理學與文苑，遂終於一分而不可合。果能奉朱子之言以為兩家之明訓，於此二途，宜各有益，固不得目為乃理學家論文之見而忽之。<sup>23</sup>

<sup>22</sup> 《朱子學提綱》，《錢賓四先生全集》第11冊《朱子新學案（一）》頁230。

<sup>23</sup> 《錢賓四先生全集》第15冊《朱子新學案（五）》頁173-174。

對於理學和文學之分離，錢穆認為是可惜的。而朱子有合文道為一之“精神氣魄”，並無輕薄文學之弊病。唯有“奉朱子之言”，才能對理學文學雙方，都均有益處。由此可見，錢穆對朱子“文道合一”論的衷心服膺了。

其四、錢穆以為，有“文道合一”之觀點，才可用通達之眼光觀察世運。因“文道合一”乃是廣義之文學觀，故而有此境界，能夠超脫於文字本身，考察歷史社會之變遷。錢穆如下言：

朱子標揭文道合一之觀點，故其評點詩文，皆極超卓，有非拘拘於僅知有意為詩文之士之所能知者。<sup>24</sup>

錢穆又引朱子評《左傳》《國語》《戰國策》等之語，加以說明。

《語類》有云：

有治世之文，有衰世之文，有亂世之文。《六經》，治世之文也。如《國語》，委靡繁絮，真衰世之文耳。至於亂世之文，則《戰國》是也。然有英偉氣，非衰世《國語》之文之比也。楚漢間文字，真是奇偉，豈易及也。（一三九）（有治世之文，有衰世之文，有亂世之文。六經，就是治世之文。好比《國語》，委靡繁雜，真是衰世之文。至於亂世之文，《戰國策》就是了。然而亂世之文的《戰國策》也有英偉氣，這不是衰世之文的《國語》的文字能夠比的。楚漢相爭時候的文字，真是奇偉，豈是輕易就可以達到的。）

《國語》辭多理寡，乃衰世之書，支離曼衍，大不及《左傳》。看此時文章若此，如何會興起國家。（八四）（《國語》文辭多、道理少，真是衰世之書。支離破碎、散漫流衍，比起《左傳》要差遠了。看那時候的文章像這樣，又怎麼能振興國家呢。）……

《國策》人所誦，然儒者不欲公言其好。《國語》與《左氏》稱內外傳，乃躋於經典之林。朱子卻說《國語》委靡繁絮，衰世之文，不如《國策》亂世之文，有英偉氣。由《國語》下啟戰國之亂，由戰國下兆秦漢之盛。以文氣窺世變，覘國運，尤足為文道合一論供一佳例，然非深於道深於文者，又烏足與語此。<sup>25</sup>

既曰文道一致，則文章自可通之於世運。而朱子重視亂世之文尤過於衰世之文，謂《戰國》亂世之文有英偉氣，非《國語》衰世文可比，則又是一項高明特達之見，非深於文

<sup>24</sup> 《錢賓四先生全集》第15冊《朱子新學案（五）》頁180。

<sup>25</sup> 《錢賓四先生全集》第15冊《朱子新學案（五）》頁180-181。

者不能知，尤非深於史者不能知，更非深於道者不能知。<sup>26</sup>

以上之言，乃是錢穆就“文道合一”文學觀之功效而言。正因為朱子有“文道合一”之廣義文學觀，故而有通達之眼光，能深於文、史與道，這是僅僅知道“有意為詩文”之人所不能的。

由以上四者可見，錢穆解析了朱子“文道合一”論之內容、價值、功用，表現出了對這一文學觀的完全讚同。

### 三、錢穆特就朱子之詩與詩論而做評述。

其一、錢穆以為，朱子認為古今詩有三大變。其引用朱子《答鞏仲至》一文，如下云：

自虞夏以來，下及魏晉為一等。晉宋間顏延之以後下及唐初為一等。沈宋以後，定著律詩，下及今日，又為一等。唐初以前，為詩固有高下，而法猶未變。至律詩出，而後詩之與法始皆大變。（從虞夏以來，一直到魏晉是一等。晉宋時候顏延之、謝靈運以後直到唐初是一等。沈佺期、宋之問以後，制定了律詩，一直到今天，又是一等。唐初以前，作詩固然是有高下之分的，但是做詩之法仍然沒有變。直到律詩出現，之後詩和詩的做法都大大地改變了。）

此在朱子心中，其所理想之詩，亦自有一標格。而以文學史觀點通論古今，衡評其於此標格之離合遠近而定其高下，此其意境之遠卓，亦決非僅僅模擬以為詩者之所知。<sup>27</sup>

而評判此三變，朱子自有一標準，這就是“以文學史觀點通論古今”。錢穆以為，朱子認為通論古今，必須有遠卓之意境。僅僅模擬作詩之人，不能有此意境。

其二、錢穆以為，朱子推崇平淡之詩，亦叫人有平淡之胸懷，蕭散之意境。其論證如下：

又曰：……古人之詩，本豈有意於平淡哉？但對今之狂怪雕鏤，神頭鬼面，則見其平。對今之肥膩腥臊，酸鹹苦澀，則見其淡耳。自有詩之初，以及魏晉，作者非一，而其高者無不出此。（古人的詩，難道是本來就是有意識地去平淡么？只是對比起如今的狂、怪、雕琢詞句、怪模怪樣來看，就顯得平和了。對比起如今的肥膩、腥臊和酸、鹹、苦、澀

<sup>26</sup> 《朱子學提綱》，《錢賓四先生全集》第11冊《朱子新學案（一）》頁231。

<sup>27</sup> 《朱子學提綱》，《錢賓四先生全集》第11冊《朱子新學案（一）》頁235。

來說，就顯得淡了。從詩出現開始，一直到魏晉，作詩的人不止一個，而高明的詩人卻無不出於平淡。）

所謂平淡，實即是心中流出，較之後來做作之詩，則若見其為平淡也。

又曰：少時嘗讀梅詩，亦知愛之。至於寂寥短章，閒暇蕭散，猶有魏晉以前高風餘韻，而不極力於當世之軌轍。（少年時曾經讀過梅堯臣的詩，也知道去喜愛。至於他寫的那些寂寞寥落的短文，悠閒、瀟灑，仍然有魏晉以前的高風餘韻，而並不大力專注於當世的規範。）

所謂蕭散，乃是一種意境，此亦是心中有此境界，流出則見此風趣耳。<sup>28</sup>

聯繫上文中，錢穆以為作詩也需要有一種遠卓境界來看，這種境界即是朱子所謂“平淡”“蕭散”。有平淡蕭散之境界，方能寫出“心中流出”之詩；而若想寫出高明之詩，又必須有平淡蕭散之心。這樣，詩才能有“風趣”。

其三、錢穆於朱子之詩極盡讚賞。

《朱子新學案》內《朱子之文學》一篇中，錢穆雖然並未引用朱子之詩文詳加評述，然而亦對其詩文大加讚賞：

北宋如邵康節，明代如陳白沙，皆好詩，然皆不脫理學氣。陽明亦能詩，而才情奔放，亦朱子所謂今人之詩也。惟朱子詩淵源《選》學，雅澹和平，從容中道，不失馳驅。……朱子儻不入道學、儒林，亦當在文苑傳中占一席之地。大賢能事，固是無所不用其極也。<sup>29</sup>

其又在《理學六家詩鈔》之序中，評價朱子詩如下：

晦翁詩澹雅淳古，上規《選》體。跨越宋、唐，卓然不倫。以詩人標準言之，晦翁亦為巨擘。<sup>30</sup>

錢穆以為，朱子寫詩好，乃是因為有學《文選》之淵源；而朱子之詩風乃是“雅澹和平，從容中道”，為一流之詩人。錢穆心中之“大賢”朱子，乃是無所不能，完美之至的。

<sup>28</sup> 《錢賓四先生全集》第15冊《朱子新學案（五）》頁189-190。

<sup>29</sup> 《錢賓四先生全集》第15冊《朱子新學案（五）》頁196。

<sup>30</sup> 《錢賓四先生全集》第46冊《理學六家詩鈔》《序》頁4。

錢穆以以上三個大方面，來概括朱子之文學觀。以錢穆觀之，朱子重視文學；朱子“文道合一”論文道並重，乃是廣義之文學論，應為學者之標的；朱子亦能為好文。並無一字抨擊，全是讚揚。這一點尤其值得注意。推及原因，錢穆尊朱已極，並不肯加一絲批評。其於《朱子新學案》之《朱子之文學》一章內，為朱子定性：

蓋朱子不僅集有宋性理學之大成，即有宋經史文章之學，亦所兼備，而集其大成焉。誠所謂致廣大，盡精微，綜羅百代，匯納群流。孔子以下，殆無其匹。晚清學者，主張漢、宋兼采。以朱子與鄭康成齊舉，抑康成非其偶也。<sup>31</sup>

錢穆言朱子於宋代經史文章之學，亦集其大成。既已大成，則斷無不讚同之理。其尊朱如此。以筆者管見，有關文與道之關係，錢穆只在《朱子新學案》與《朱子學提綱》中論述朱子文學觀之時詳加剖析、系統說明。對於朱子之觀點，錢穆完全同意，高度讚揚，並以“文道合一”之文學觀為理學者文學者之共同標的。故而，“文道合一”亦可被認為是錢穆文學觀之極重要內容。因為錢穆完全服膺朱子之“文道合一”，故錢穆論文學，大體不能脫朱子理學文學觀之局限。比如，錢穆在談人生與文學時如是言：

中國文人常言“文以載道”，或遂疑中國文學頗與現實人生不相親。此又不然。凡所謂“道”，即人生也。<sup>32</sup>

宋、明理學注重人格修養，這正如韓愈所說：“我非好古之文，好古之道也。”尤其如朱子、陽明，是理學家中能文的。他們的文章，也都能把自己的日常生活一切事物及對外應接都裝入其詩文中去。從這裏，我們更看得清楚些，所謂“文以載道”，其實是要在文學裏表現出作者的人生。<sup>33</sup>

中國人貴從內心同處言，尋常平實，而其可樂可喜，可哀可怨，有更深入更生動者。孔子即以詩教，宋代理學家言“喫緊為人”，亦無不知欣賞文學。即如周濂溪“光風霽月”，程明道“如坐春風”，人生即如文學。而理學家之能詩能文，超出於一般詩人文人者亦多。此見中國文學實即一種“人生哲學”。今必分文學、哲學而為二，斯其意義與價值，

<sup>31</sup> 《錢賓四先生全集》第15冊《朱子新學案（五）》頁167。

<sup>32</sup> 《錢賓四先生全集》第45冊《中國文學論叢》頁20。

<sup>33</sup> 《錢賓四先生全集》第45冊《中國文學論叢》頁81。

惟各見其減，不見其增矣。<sup>34</sup>

說的是人生與文學，其實還是不能跳出朱子“文道合一”的圈子。錢穆之所以喜愛理學家之詩，正是因為其認為理學家在日常中悟人生之道，並用文章表現出來。而將此有境界之日常生活裝入詩文，便是“文以載道”了。有道之文，就可超出“一般詩人文人”之文。在他們那裏，道與文乃是統一不可分的。“今必分文學哲學而為二，斯其意義與價值，惟各見其減，不見其增矣”之句，與前文所引“而理學與文苑，遂終於一分而不可合。果能奉朱子之言以為兩家之明訓，於此二途，宜各有益”之句，如出一轍。錢穆又於《理學六家詩鈔》之序中言：

理學者，所以學為人。為人之道，端在平常日用之間。而平常日用，則必以胸懷灑落、情意恬淡為能事。惟其能此，始可體道悟真，日臻精微。而要其極，亦必以日常生活之灑落恬淡為歸宿。……斯鈔一以顯示作者之日常生活為主。所鈔六家，固皆一代之魁傑，理學之宗師，外論其時代，內窺其性情，既已各別不同，其論學宗旨，亦復相殊互異。然觀其平常日用間之胸懷意境，灑落恬淡，則大體相若。可證此乃理學家之共同嚮往與其共同躬修之所在。<sup>35</sup>

錢穆以為，理學乃是一種學習為入之道之學，這種為入之道表現在日常生活中，便是灑落恬淡之胸懷。這與前文論朱子“平淡之詩”“平淡胸懷”，亦是大體一致。錢穆喜愛理學家詩，甚至編纂《理學六家詩鈔》，與其推崇朱熹之文學觀，有著必然之聯繫。

## 第二章 錢穆與朱子評價韓愈之不同

前文所述，錢穆以“文道合一”之文學觀為學者之圭臬，以為文道當並重，不可偏廢。而論及中國文學史上能文道並重之人物，錢穆則每每談及韓愈。錢穆眼中之韓愈，又是如何呢？

錢穆以為，韓愈之文學，由心而生，並以“堯、舜、禹、湯、文、武、周公、孔、孟之道”來作文。其如下云：

<sup>34</sup> 《錢賓四先生全集》第25冊《現代中國學術論衡》頁262。

<sup>35</sup> 《錢賓四先生全集》第46冊《理學六家詩鈔》《序》頁3-4。

推韓公之意，謂天地間一切道，一切藝，皆由人心生。人心得所養，而外有以合乎天，然後天人相應，而道彰焉，藝美焉。……而韓公則固以堯、舜、禹、湯、文、武、周公、孔、孟之道以治其文者，故曰：“行之乎仁義之途，遊之乎《詩》、《書》之源。”大本即立，內有所感，外有所觀，乃一於文焉發之。<sup>36</sup>

錢穆以為，文亦是藝術之一種。其言：“何謂文？此涉藝術問題。故文學亦即是一種藝術。”<sup>37</sup>既如此，於錢穆心中，韓愈的文與道是統一於心中而外發的。故而，文的根本亦能上溯到《詩經》、《尚書》的精神，能切合仁義。因為道和藝是人心中自願發出的，而非外在強加之物，故而可以“天人相應”，“道彰”“藝美”。文與道能自然地合一。如此說來，韓愈之文，應該符合“文道合一”之標準。

其一、韓愈立於純儒家之地位而昌言儒道，故其道純。

於《雜論唐代古文運動》一文中，錢穆盛讚韓愈文道說於中國文學史上之地位。於錢穆所見，韓愈之偉大，在於倡導古文運動、發揚儒家之道。

然則治宋學當何自始？曰：必始於唐，而昌黎韓氏為之率。……韓氏論學雖疎，然其排釋老而返之儒，昌言師道，確立道統，則皆宋儒之所濫觴也。……獨昌黎韓氏，進不願為富貴功名，退不願為神仙虛無，而昌言乎古之道。曰為古之文者，必有志乎古之道，而樂以師道自尊。此皆宋學精神也。<sup>38</sup>

必待昌黎韓公出，始原本《六經》，承李杜古詩運動之後，又重倡古文運動。其言曰：“好古之文，乃好古之道也。”於是始正式提出一“道”字，為其詩文作骨幹。又首唱堯、舜、禹、湯、文、武、周公、孔、孟歷古相傳之道統。是至昌黎，乃始為站在純儒家之地位而提倡復古者。故論唐人文學復古之大潮流，亦必達於昌黎，乃始有窮源竟委之觀，兼包並蓄之勢。太白所謂“文可以變風俗，學可以究天人”<sup>39</sup>，亦必至於昌黎，乃庶乎更臻於圓滿成熟之境界也。<sup>40</sup>

以錢穆觀之，韓愈之道乃是正道，是“原本六經”的，講求“道統”，是“站在純儒家地位”

<sup>36</sup> 《錢賓四先生全集》第19冊《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（二）》第四卷頁55。

<sup>37</sup> 《錢賓四先生全集》第25冊《現代中國學術論衡》頁259。

<sup>38</sup> 《錢賓四先生全集》第16冊《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》頁2。

<sup>39</sup> 此句出自李白《為宋中丞自薦表》，參考《李太白全集》頁1218中華書局1977年版。

<sup>40</sup> 《錢賓四先生全集》第19冊《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（二）》第四卷頁24。



的，是其詩文之“骨幹”，故而韓愈之文乃是有道之文，已達到“變風俗”、“究天人”之“圓滿成熟”之境界了。故而治宋學，也必上溯至韓愈。錢穆此處甚重一個“純”字。正因為“純”，韓愈才能昌言儒道，不講求世俗之“富貴功名”與釋老之“神仙虛無”，方可上接古來之道統，下啟宋學之精神。

其二、錢穆以為，韓愈發起之古文運動，乃是立於“純文學立場”之大貢獻。於《雜論唐代古文運動》一文中，錢穆寫道：

然韓、柳之倡復古文，其實則與真古文復異。一則韓、柳並不刻意子、史著述，必求為學術專家。二則韓、柳亦不偏重詔令、奏議，必求為朝廷文字。韓、柳二公，實乃承於辭賦、五七言詩盛興之後，純文學之發展，已達燦爛成熟之境，而二公乃站於純文學之立場，求取融化後起詩、賦純文學之情趣風神以納入於短篇散文之中，而使短篇散文亦得侵入純文學之閭域，而確占一席之地。故二公之貢獻，實可謂在中國文學園地中，增殖新苗，其後乃蔚成林藪，此即後來之所謂“唐宋古文”是也。<sup>41</sup>

故韓、柳之大貢獻，乃在於短篇散文中再創新體，如“贈序”，如“雜記”，如“雜說”。此等文體，乃絕不為題材所限，有題等如無題，可以純隨作者稱心所欲，恣意為之。<sup>42</sup>

建安以下，知為文以騷、賦、詩歌為尚，此為中國文學史上文學獨立之一種新覺醒。然騷、賦、詩歌，必尚辭藻，必遵韻律，為之不已，流弊所趨，乃競工外飾，忘其內本。唐興，陳、李掄揚風雅，高談興寄，正以藥其病。至於韓、柳有作，乃刻意運化詩、騷、辭賦之意境而融入之於散文各體中，並可剝落藻采，遺棄韻律，洗脂留髓，略貌存神；而文學之園地，轉更開拓，文學之情趣，轉更活潑。柳公之所為微遜於韓者，正為其洗汰之未淨，猶多存辭賦痕跡，而轉使後之治文學史者，乃可從柳公之藩籬，而進窺韓公之堂奧。而韓、柳二公在當時之一番精心密意，轉得因此而益見其昭晰朗顯焉。鴛鴦繡出，金針未藏，此亦中國文學史上一極值得鑽尋之節目也。<sup>43</sup>

宋薇、馬力亦於《從文以載道到藝術就是人生——錢穆美學思想基本問題論析》<sup>44</sup>一文中引上

<sup>41</sup> 《錢賓四先生全集》第19冊《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（二）》第四卷頁69。

<sup>42</sup> 《錢賓四先生全集》第19冊《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（二）》第四卷頁70。

<sup>43</sup> 《錢賓四先生全集》第19冊《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（二）》第四卷頁71。

<sup>44</sup> 宋薇 馬力《從文以載道到藝術就是人生——錢穆美學思想基本問題論析》《河北大學學報》

述三段，認為錢穆讚揚韓愈所倡古文運動為一文風開新運動，從而論證錢穆的藝術本體論中並不輕視文學，和傳統理學家不同。然而細考錢穆原文，更深入來看，此種開新，實際上是針對文學體裁之一改革，即是文中所說“站於純文學之立場，求取融化後起詩賦純文學之情趣風神以納入於短篇散文之中”，即凝練已有詩賦之內涵而以短篇散文書之，從而將短篇散文創作納入純文學之領域，而使得文學更加“開闊”“活潑”。韓柳所倡導之古文已不是真正之古文，而是一種全新之體裁。這是“中國文學史上一極值得鑽尋之節目”。以上方可見，錢穆於韓愈文學開新上之著重用筆，可顯示錢穆一種就文論文的對“純文學”發展之重視。此種立足於“純文學”立場之上之思考，亦是錢穆文學觀之可貴處。此種不輕視文、就文論文之態度，亦是錢穆於論述朱子文學觀時所評點讚許過的。綜合其品評韓愈之語可見，錢穆以為韓愈重文重道，道亦純，文亦純，兩不偏廢。故而錢穆所論之文道合一，有如下之特點：

其一、於錢穆看來，道為主體，文從道出。如錢穆對韓柳之文的評價，須達到“鴛鴦繡出，金針未藏”之境界，須“洗脂留髓，略貌存神”。“鴛鴦”指美麗之刺繡，喻文；而金針乃是刺繡之道具，喻為文之憑據與根本，即道。“競工外飾”之文學，如“騷賦詩歌”，徒尚辭藻，乃是“忘其內本”的，趨於“流弊”。這與前述朱熹所言“不是先理會得道理了，方作文，所以大本都差”意基本一致。而韓愈之所以比柳宗元更出色，乃是因為韓愈文章更不存“辭賦痕跡”，僅留“意境”，更加乾淨。而韓愈更昌言“古之道”，志乎古道而為古文，確立了“道統”，成為宋儒之濫觴。故而，不可不重於道。

其二、錢穆雖強調道之重要，然亦同樣不輕視文。這從上述錢穆立於“純文學”立場之思考中已然表明。為表現道之內涵，文亦是不可缺之物。錢穆不否定文學之功用。這一點，和周濂溪“文以載道”之觀點同，而於伊川“作文害道”迥異——其反復強調肯定文學之藝術價值，又肯定韓愈在“純文學”立場上，於文學形式之創造等文學開新舉動。

故而以錢穆見之，文道乃是統一之物。文道須並重，二者一統。作文不能失道，而若隔離文與道，則文亦不能成文。錢穆借評論章學誠文學觀時言道：“學文學不能單從某一人之文學本身去學。這一觀點，卻近於韓愈‘文以載道’的說法。不能認為文學即是道，而道即載在文學中。<sup>45</sup>”如韓昌黎之文，便是承襲“六經”精神的載道之文。這符合前文所引朱熹之“豈有文反能貫道之理”之語。文道並重而為有道之文，如韓愈志古道、寫古文，乃是錢穆著重強調之處。以品評韓昌黎之例可見，錢穆注重的仍舊是文道並重，不可偏廢。此與前文所述錢穆所觀朱子之“文道合一”論基本一致。換言之，錢穆評韓愈，所秉持之標尺，正是朱子“文道合一”之文學觀。錢穆實在是完全承襲了此一觀點，並用以具體的文學批評實踐。從這一點上來說，錢穆和朱子並無什麼區別。

---

2005年第6期頁107-108。

<sup>45</sup> 《錢賓四先生全集》第45冊《中國文學論叢》頁85。

錢穆完全認同朱子“文道合一”之文學觀，並認為韓愈乃是符合“文道合一”標準之人物。然而，值得奇怪的是，朱子本人並不完全肯定韓愈之文。以下簡述之。

朱子於《讀唐志》一文中，有如下之意見：

東京以降，訖于隋唐，數百年間，愈下愈衰，則其去道益遠，而無實之文亦無足論。韓愈氏出，始覺其陋，慨然號於一世，欲去陳言以追《詩》《書》《六藝》之作。而其弊精神、糜歲月，又有甚於前世諸人之所為者。<sup>46</sup>（東漢以後，直到隋唐，數百年間，越來越衰頹，文離開道越來越遠，而沒有實際內容的文也不足提了。直到韓愈出來，才覺得文章鄙陋，一時激憤呼號，想要除去舊言語以上追《詩經》《尚書》六藝之作，但是韓愈有害精神、浪費時間的舉動，又遠超過前世的人了。）

自朱子觀之，自東漢至隋唐數百年間，由於道之失落衰退，文章亦遠離道而皆成為“無實之文”。韓愈雖思“欲去陳言以追《詩》《書》《六藝》之作”，即恢復有道之文，實則亦只是“弊精神、糜歲月”，耗費時間精力而無所獲。而且，比諸前人，韓愈重視文字之程度更甚。朱子於此處並未肯定韓愈恢復古道之努力。

於是《原道》諸篇始作……其徒和之，亦曰：“未有不深於道而能文者。”則亦庶幾其賢矣。然今讀其書，則其出於諂諛戲豫放浪而無實者自不為少。若夫所原之道，則亦徒能言其大體，而未見其有探討服行之效，使其言之為文者皆必由是以出也。<sup>47</sup>（於是才開始寫了《原道》等篇章……韓愈的弟子們也附和他說：“沒有不深於道而能寫好文章的。”也是在希望賢德吧。然而現在讀他的書，發現出於諂媚、遊戲的心態而放縱沒有內容的東西也不少。至於他所以為根本的道，也不過是能說個大概，卻沒有見到有探討實踐的效用，從而能使作文的人都能依據這個道而作文。）

朱子讀韓愈之書，指出韓愈《原道》等文不能深於道，而充滿阿諛諂媚、遊戲放浪之內容，乃是“無實”的。其原因在於，韓愈對儒家之道只是徒能言“大體”。韓愈作《原道》，人肯定其“未有不深於道而能文者”，即道於文之決定意義。然而，韓愈只是口頭上說而已，

<sup>46</sup> 《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》卷七十，《朱子全書》第23冊頁3374-3375 上海古籍出版社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。

<sup>47</sup> 《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》卷七十，《朱子全書》第23冊頁3375 上海古籍出版社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。

並沒有於日常生活中以自身之行動“探討服行”道德。由此看來，朱子已將韓文之缺點歸結至韓愈己身道德修養之淺薄上來。

其論當世之弊，則但以詞不己出而遂有神徂聖伏之歎。至於其徒之論，亦但以剽掠僭竊為文之病，大振頹風、教人自為為韓之功。則其師生之間、傳受之際，蓋未免裂道與文以為兩物，而於其輕重緩急、本末實主之分，又未免於倒懸而逆置之也。<sup>48</sup>（韓愈說到當世的弊病，只是以為文詞不出於自己之口，而有神靈消逝聖人隱藏的感歎。至於他弟子們的話，也只以為剽竊抄襲是文章的弊病，把振起頹廢的風氣、教導人自己作文為韓愈的功績。那麼他們師生之間教導收受的時候，大約也未免把文和道分為兩個東西的錯誤。而在輕重緩急、本末實主的區分上，也未免倒懸反放了。）

朱子以為，韓昌黎及其弟子，只將文章之病歸結為“詞不己出”、“剽掠僭竊”，單單從作文本身著眼，而忽視了決定文的道。此乃是“裂道與文以為兩物”之舉動。此一舉動，同時也混亂了道與文之主末輕重關係，“未免於倒懸而逆置”，將文與道的次序顛倒了。

朱子又云：

只是不曾向裏面省察，不曾就身上細密做工夫。……故立朝議論風采，亦有可觀，卻不是從裏面流出。平日只以做文吟詩，飲酒博戲為事。<sup>49</sup>（不曾向內心反省察看，不曾在身上細密地做功夫……所以他所說的朝議、所論的風俗，也有可以看的地方，卻並不是從他內心裏面流出來的。他平時只是做文吟詩、飲酒賭博而已。）

如韓退之，雖是見得個道之大用是如此，然卻無實用功處。它當初本只是要討官職做，始終只是這心。他只是要做得言語似《六經》，便以為傳道。至其每日工夫，只是做詩、博奕、酣飲、取樂而已。<sup>50</sup>（比如韓愈，雖然看得到道的大用是這樣，然後卻沒有著實用功的地方。他當初原本只是想要討一個官職來做，始終只是這個心思而已。他只是想把言語寫得和六經一樣，就以為是在傳道了。至於每天所花費時間精力的，只是作詩、賭博、暢飲、取樂罷了。）

<sup>48</sup> 《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》卷七十，《朱子全書》第23冊頁3375上海古籍出版社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。。

<sup>49</sup> 《朱子語類》卷一百三十七，《朱子全書》第18冊頁425上海古籍出版社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。

<sup>50</sup> 《朱子語類》卷一百三十七，《朱子全書》第18冊頁424上海古籍出版社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。

朱子以上語，眼光極為老辣，批評極為刻薄。朱子以為，韓愈內心所想，不過是追求世俗之功名利祿，“要討官職做”。韓愈口中言重道，實則“不曾向裏面省察”，只顧“做文吟詩”，在文辭上用功，而心中並無應有之道德修養。故其文“不是從裏面流出”，和其心不能一致。朱子將韓愈之作詩作文，與賭博、飲酒之事並列，可見其鄙視之態度。至於說“只是要討官職做”，這更趨近一種對於韓愈人格之否定論了。在朱子看來，韓愈並不能符合“文道合一”之標準。

今人學文者何曾作得一篇？枉費了許多氣力。大意主乎學問以明理，則自然發為好文章，詩亦然。<sup>51</sup>（今天的學文的人，如何能做得了一篇？白費了好多力氣。在要義上以學問為主，明白道理，就自然能抒發成好文章，詩也是一樣。）

朱子以為，通過做學問而明白義理、培養道德，則自然而然地能寫出好詩好文章。因此朱東潤在《中國文學批評史大綱中》說“自晦庵言之，文辭之用，貴於明義理。”<sup>52</sup>關於朱子對韓愈之批判，許家星在《朱熹論韓愈之文學理念及其創作》一文中指出了其原因：

韓愈的錯誤就在於肯定了文對於道的獨立意義，而且捨本逐末，沒有在道上下工夫，反而將精力耗費在文上。<sup>53</sup>

這對於主張文道合一之朱子，自然是無法接受之事。儘管朱子亦有“韓文公詩文冠當時，後世未易及。”<sup>54</sup>之類讚美韓愈文章之語，然而在理論上，仍猛烈批判韓愈道德修養不足，割裂文道之事實。於朱子觀之，韓愈並非符合“文道合一”標準之文人。

回轉頭來再論錢穆。錢穆所持“文道合一”之理念，於朱子無二。然而，用“文道合一”針對具體人物（如韓愈）實行文學批評之時，卻得出完全相反之結論。錢穆並不是沒有注意到此點。其於《朱子新學案》之《朱子之文學》一章中，也引述了上述一些朱子對於韓愈之批判<sup>55</sup>，但僅僅輕描淡寫地如是說：

<sup>51</sup> 《朱子語類》卷一百三十九，《朱子全書》第18冊頁4299 上海古籍出版社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。

<sup>52</sup> 朱東潤《中國文學批評史大綱》頁173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。

<sup>53</sup> 許家星《朱熹論韓愈之文學理念及其創作》《鄭州輕工業學院學報》2008年第1期頁18。

<sup>54</sup> 《朱子語類》卷一百三十八，《朱子全書》第18冊頁4297 上海古籍出版社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。

<sup>55</sup> 《錢賓四先生全集》第15冊《朱子新學案（五）》頁174。

以上就唐宋文人之日常生活與其心性修養言。文人不務修身明道，其弊既如此。<sup>56</sup>

並未詳述自己意見與朱子之不同。其原因又為何呢？

### 第三章 前述問題原因之探究

其一、錢穆是尊韓的。

昌黎韓文公，不僅為唐代一人物，實係中國全史上下古今三四千年來少數之第一流大人物也。其創為古文，起八代之衰，下啟宋、元、明、清四代之古文學，而為不祧之祖，其在中國文學史上，少與倫比……<sup>57</sup>

錢穆以為，韓愈在文學史上建樹極大，創造了“古文”之一文體，開啟了後世之文學，故可以稱為國史上“少數之第一流大人物”。如前文所述，於韓愈文學開新這一點，錢穆十分推崇。這是與朱子所見不同的。然而，除卻對韓愈本身之欣賞外，錢穆之尊韓，又有其特有之歷史背景。錢穆曾做《為誹韓案鳴不平》一文，其中如是說：

民國以來，競務為崇洋譴華，在中國歷史上不甘仍留一好人。孔子大聖，以“子見南子”肆嘲弄。岳武穆為武聖，以“軍閥”恣誣。韓公亦自不免。近日潮州同鄉會有一《潮州文獻》雜誌，發行人郭某，於雜誌上特刊一文，謂韓公在潮染風流病，以致體力過度消耗，及後誤信方士硫磺鉛下補劑，離潮州不久，果卒於硫磺中毒。<sup>58</sup>

由上文可見，錢穆以為民國以後之學術風氣，在於“崇洋譴華”，肆意攻擊批判中國史上之人物。甚至有人寫文，言韓愈之死，乃是因為在潮州時染性病，又信方士而導致硫磺中毒。故而錢穆奮起寫文慾為韓愈平反。《為誹韓案鳴不平》中末尾一段，錢穆如是言：

民國以來，吾學術界亦有共鳴，則為崇洋譴華，是今非古。余不幸，乃獨於前清之末即

<sup>56</sup> 《錢賓四先生全集》第15冊《朱子新學案（五）》頁176。

<sup>57</sup> 《錢賓四先生全集》第45冊《中國文學論叢》頁325。

<sup>58</sup> 《錢賓四先生全集》第45冊《中國文學論叢》頁326。

知讀韓公書，乃不能免於敬賢尊古之夙習。近代學術界亦非不敬賢尊古，惟所敬所尊乃洋賢洋古，而惟己是譴。余則譴己生之不肖，不敢譴祖宗之無德。因以自孤於一世，則每以韓公之頌伯夷者自慰自勉。偶值誹韓風潮，亦不免作不平鳴，然其聲啞以嘶，其辭晦而抑，並不能鳴舉國一世之盛，而特為國族往古鳴不平。<sup>59</sup>

錢穆言自己於清末之時便讀韓愈之書，不能免“敬賢尊古之夙習”。錢穆生於西元一八九五年，時為清光緒二十一年。而清亡於西元一九一一年，時錢穆十六歲。換言之，錢穆之尊韓，本身即帶有一種幼少時養成的尚古尚賢之心理。而民國以後，學術界“崇洋譴華，是今非古”，錢穆自然大為不滿。“余則譴己生之不肖，不敢譴祖宗之無德。”之句，語氣可謂極重。換言之，於錢穆看來，“崇洋譴華，是今非古”，已經是譴責祖宗之不義行為了。對於中國先賢，錢穆自身乃是“不敢譴”的。可以說此乃一種尚古的思想，一種極具民族主義之歷史觀。於《國史大綱》之篇首，錢穆如是言：

所謂對其本國已往歷史略有所知者，尤必附隨一種對其本國已往歷史之溫情與敬意。否則只算知道了一些外國史，不得云對本國史有知識。<sup>60</sup>

這應該是對於“敬賢尊古”的極好注解了。以錢穆看來，如果不對本國歷史有“溫情”與“敬意”，那“本國史”便與“外國史”並無差別。“溫情”與“敬意”，乃是對於治“本國史”的應有且必要之態度。錢穆弟子余英時，於《一生為故國招魂》一文中寫道：

錢先生對於知識的態度，與中外一切現代史學家比，都毫不遜色。“五四”時人所最看重的一些精神，如懷疑、批判、分析之類，他無不一一具備。他自己便說道，他的疑古有時甚至還過於顧頡剛。但是他不承認懷疑本身即是最高價值。他強調：“疑”是不得已，是起於兩信不能決。一味懷疑則必然流於能破而不能立，而他的目的則是重建可信的歷史。<sup>61</sup>

錢穆否定“破”，讚同“立”，否定“一味懷疑”，讚同建立“可信的歷史”。這一點，從其弟子余英時的話中便可以看出。故而，錢穆尊韓，是與其尊賢尚古之民族主義歷史觀相符合的。

<sup>59</sup> 《錢賓四先生全集》第45冊《中國文學論叢》頁330。

<sup>60</sup> 《錢賓四先生全集》第27冊《國史大綱（一）》頁19。

<sup>61</sup> 余英時《錢穆與中國文化》頁25 上海遠東出版社1994年版。

其二、錢穆是極端尊朱的。

錢穆自身，有“破門戶”之一說法。《兩漢經學今古文平議》序中，錢穆針對清儒治學風氣，有如下之論：

蓋清儒治學，始終未脫一門戶之見。其先則爭朱、王，其後則爭漢、宋。其於漢人，先則爭鄭玄、王肅，次復爭西漢、東漢，而今、古文之分疆，乃由此而起。<sup>62</sup>

又於《朱子新學案》序中言：

學者困於門戶之見，治理學則必言程朱、陸王。

學者又有經學、理學乃至漢學、宋學之辯，此等皆不免陷入門戶。朱子學，廣大精深，無所不包，亦無所不透，斷非陷入門戶者所能窺究。本書意在破門戶，讀者幸勿以護門戶視之。<sup>63</sup>

上兩段文字，余英時於《錢穆與中國文化》中亦曾引用<sup>64</sup>。然而細看此段文字，其實並不如余英時所說是錢穆“破門戶”之舉。錢穆說朱子學“廣大精深，無所不包，亦無所不透”，這已經有一種立於朱子門戶的優越感了。在《朱子學提綱》中，錢穆如是言：

在中國歷史上，前古有孔子，近古有朱子，此兩人，皆在中國學術思想史及中國文化史上發出莫大聲光，留下莫大影響。曠觀全史，恐無第三人堪與倫比。孔子集前古學術思想之大成，開創儒學，成為中國文化傳統中一主要骨幹。北宋理學興起，乃儒學之重光。朱子崛起南宋，不僅能集北宋以來理學之大成，並亦可謂其乃集孔子以下學術思想之大成。此兩人，先後矗立，皆能匯納群流，歸之一趨。自有朱子，而後孔子以下之儒學，乃重獲新生機，發揮新精神，直迄於今。<sup>65</sup>

以錢穆觀之，朱子乃是能與孔子比肩之中國歷史上唯二大賢，“恐無第三人堪與倫比”。朱

<sup>62</sup> 《錢賓四先生全集》第8冊《兩漢經學今古文平議》頁3-4。

<sup>63</sup> 《錢賓四先生全集》第11冊《朱子新學案（一）》頁13。

<sup>64</sup> 余英時《錢穆與中國文化》頁32 上海遠東出版社1994年版。

<sup>65</sup> 《朱子學提綱》，《錢賓四先生全集》第11冊《朱子新學案（一）》頁1-2。



子集孔子以下學術之大成，又使得孔子以下之儒學發揮出新的精神，因而是承前啟後之關鍵性人物。讚美如此，崇敬之心溢於言表。錢穆又於《朱子新學案》序中言：

朱子學範圍廣大，涵義精深，後人渺能兼涉而都通。本書作者自問所知淺狹，不敢強不知以為知。然而百官之美，宮室之富，意存指述，非為誇大。讀者固不當拈小節，於前世大賢輕肆譏呵；亦勿謂本書有崇揚，無抨彈，遂疑其亦落在門戶中，知進不知出也。<sup>66</sup>

此話就說得極為明白了。錢穆首先讚美朱子學之博大精深，次又告誡讀者“不當拈小節，於前世大賢輕肆譏呵”。這充分表明了錢穆尊重“前世大賢”之朱子，不允許對朱子輕易進行批判之行為。因此《朱子新學案》一書乃是“有崇揚，無抨彈”，並不對朱子做一絲一毫之反對或批判。故而，錢穆論朱子之“文道合一”論，十分讚同，全盤接受，乃是自然而理所應當之事。錢穆自己也知“本書有崇揚，無抨彈”，卻又告誡讀者“勿言”，不要“疑其亦落在門戶中，知進不知出”，這已有些此地無銀三百兩之味了。錢穆讚美朱子之偉大，朱子學之廣博，“有崇揚，無抨彈”，並告誡讀者要尊重朱子，由此可見錢穆端立於朱子門戶之態度。錢穆於《宋明理學概述》序中一段，寫得尤其明白真摯、感動人心：

顧余自念，數十年孤陋窮餓，於古今學術略有所窺，其得力最深者莫如宋明儒。雖居鄉僻，未嘗敢一日廢學。雖經亂離困厄，未嘗敢一日頹其志。雖或名利當前，未嘗敢動其心。雖或毀譽橫生，未嘗敢餒其氣。雖學不足以自成立，未嘗或忘先儒之渠獲，時切其嚮慕。雖垂老無以自靖獻，未嘗不於國家民族世道人心，自任以匹夫之有其責。雖數十年光陰浪擲，已如白駒之過隙，而幼年童真，猶往來於我心，知天良之未泯。自問薄有一得，莫匪宋明儒之所賜。<sup>67</sup>

錢穆自謂己身學術“得力最深者莫如宋明儒”，又“未嘗或忘先儒之渠獲，時切其向慕”。朱子自然屬於“宋明儒”之列，而考察錢穆對朱子全無批判、只是崇揚之態度，的確是切合“先儒之渠獲”的。此乃是自幼養成之心態，貫穿其學術生涯。

以上二條可明，錢穆為何完全讚同朱子“文道合一”之文學觀，舉其為學者之標的；又為何在用“文道合一”論高度評價韓愈，並在和朱子之論韓愈有所不同時，並不明白寫出了。其一，出於錢穆本身自幼養成尊賢尚古之心態而言，錢穆高度讚揚韓愈於中國文學史之功績，

<sup>66</sup> 《錢賓四先生全集》第11冊《朱子新學案（一）》頁14。

<sup>67</sup> 《錢賓四先生全集》第9冊《宋明理學概述》頁8。

不願意批判韓愈。其二，出於錢穆嚴守朱子門戶之心態而言，朱子所謂“文道合一”，即是最好之文學觀與文學標準。錢穆不吝用此標準來讚美韓愈。而然，這與朱子批判韓愈之態度迥異。出於“有崇揚，無抨談”、謹守“先儒之架獲”之心態，此種與朱子之所異處，錢穆並不能拿出詳談。錢穆固然尊韓，但在學術淵源上，則更貼近朱子。言朱子之所非，於錢穆言乃是不可能之事。兩難之下，錢穆只能不做深究。看似矛盾，其實統一。

學者李敖曾經在《我最難忘的一位學者——為錢穆定位》中評價過錢穆：

錢穆作為史學家，本已令人皺眉；但他不以此為足，傾餘生之力，還要做經學家、理學家，甚至儼然當代朱子，這就更鬧了大笑話。嚴格說，他在這一方面的著作多是失敗的，更見其迂腐。<sup>68</sup>

李敖未免攻擊刻薄過甚，但“儼然當代朱子”之語，並無大錯。從錢穆對朱子“文道合一”之全盤讚同與繼承來看，確有隱隱以儒宗自許而為朱子代言之味。僅以此點觀之，李敖說錢穆乃是“反動派的史學”，對本國歷史太過於滿意，<sup>69</sup>雖用詞過當，亦有其理。而余英時論錢穆是“為故國招魂”，認為“他（錢穆-筆者注）從來不掩飾他對於傳統文化的尊重，也不諱言他的考證是為了一個更高的目的服務——從歷史上去找尋中國文化的精神”<sup>70</sup>，則是從正面加以肯定。從錢穆尊賢尚古的心態來看，他正是孜孜不倦以尋求以及服膺中國文化固有之傳統。

臺灣歷史學家汪榮祖亦云：

世人多知，錢賓四頗具民族主義意識，並見諸其史學，然其民族主義也未脫傳統的華夷之辨與漢文化意識，以及崇宋尊朱的基本心態。<sup>71</sup>

汪榮祖此文雖是評論錢穆《近三百年學術史》之作，說錢穆“一本尊崇宋儒之心，以及信仰朱子之執著”<sup>72</sup>來對抗今文改制，評價其是“由二十世紀的人，寫十九世紀之書。”<sup>73</sup>然以此概括錢穆之學術態度亦不為不當。錢穆此種“招魂”式的對於中國文化之固守意識與尊朱之立場，也正是錢穆評價與實踐朱子“文道合一”文學觀之基本心態。其對於道統之尊重、對

<sup>68</sup> 《李敖大全集》第4冊《李敖自傳》頁308中國友誼出版公司2010年版。

<sup>69</sup> 《李敖大全集》第4冊《李敖自傳》頁307-308中國友誼出版公司2010年版。

<sup>70</sup> 余英時《錢穆與中國文化》頁25上海遠東出版社1994年版。

<sup>71</sup> 汪榮祖《錢穆論清學史述評》《臺大歷史學報》2000年12月第26期頁115。

<sup>72</sup> 汪榮祖《錢穆論清學史述評》《臺大歷史學報》2000年12月第26期頁99。

<sup>73</sup> 汪榮祖《錢穆論清學史述評》《臺大歷史學報》2000年12月第26期頁115。

於朱子學說之全盤接受、對於自己和朱子意見不一的不置可否，正體現了錢穆將學術立場放於具體學術問題之前的學術態度。此一種中國傳統儒者之姿態，躍然其著述之中。朱子生於西元一一三零年，即十二世紀之人。從錢穆與朱子同聲唱和之事而論，則更可言錢穆乃是“十二世紀的人，寫十九世紀之書”了。